

拉尊南卡吉美伏藏法系对哲孟雄南嘉王朝初期宗教格局的影响^{*}

许渊钦

内容摘要：拉尊南卡吉美（**ឡានកោមុជ្ជិត្យ** 1597-1652 年）、阿大生巴钦波（**អាតិនបាទិនុជ្យិត្យ** 1592-1656 年）、噶陀仁增钦波（**កាគទុនិស្សិតិនុជ្យិត្យ** 17 世纪）三位宁玛派宗教人物通过法王升座仪式赋予彭措南嘉管理哲孟雄的权力，以此契机，开启宁玛派伏藏法系从卫藏中心向哲孟雄的传播与发展。初传哲孟雄的伏藏法系中，以继承大伏藏师贾春宁波法系并开创哲孟雄伏藏法系的拉尊南卡吉美为主要代表。彭措南嘉被升座为法王后，他在哲境内支持拉尊伏藏法系的传法活动并推进了该法系寺院的建设。在哲孟雄宗教发展的进程中，卫藏教权中心与哲孟雄地方的南卡吉美伏藏法系持续性双向互动，逐渐形成法脉继任、宗派隶属、主分寺从属等制度化发展模式。该伏藏法系对哲孟雄南嘉王朝初期的宗教格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20 世纪藏传佛教在锡金、不丹、拉达克的传播与发展研究”（18BMZ020）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中，各宗派的历史叙事皆是以宗派法系继承者的传记为主轴所构成的，藉此展现法脉相续不断的清净传承。其中，前译宁玛派（བྱང་རྒྱ རྩିଦ୍-ଆ-ଘ）¹ 有两种特别殊的传播途径：“远传承—教言传承（ମି-ଶ୍ରୁଦ୍-ବଗ୍ରାମ）”与“近传承—伏藏传承（ତ୍ରେ-ଶ୍ରୁଦ୍-ଏନ୍ତିରାମ）”。而特点最突出、最鲜明的就是伏藏传承，伏藏师开取一系列的伏藏教法，再以此“伏藏教法”建构出一种真正统性与完整性的传承模式，形成一种在教法类型与传

播形式上极具伏藏师个人色彩的传承法系，称为“伏藏法系”²。据该派传统的说法，约从11世纪以后，伏藏师们陆续出现，发展出各具特色的伏藏法系。就“历代伏藏师持续开创了伏藏法系”这点来说，伏藏法系实际上扩大了宁玛派的传承形式、文本类型以及教义内容的多元性。在各支伏藏法系中，北伏藏约在14世纪最早传入了哲孟雄³。此后到17世纪建立地方政权，在此期间只有北伏藏法系（བྱང་བྱତ් རි）的开创者伏藏师仁增贵登（རිඹා රුහිං ສේං පූජා 1337-1408年）⁴及他的转世阿里伏藏师仁增列滇杰（රිඩා රුහිං එං දිං පූජා）

2 伏藏法系传承究竟始于何时？据传统的说法，第一位伏藏师可以上溯到 11 世纪前后的桑杰喇嘛，不过其伏藏文本和人物传记到了 19 世纪末才由宗萨蒋扬钦哲旺波和贡珠云丹嘉措重新整理并保存。因此，有必要回到有日月伏藏祖师称号的娘热·尼玛沃色（ མਾନ୍ତ୍ରିକ རୂପ སୁର୍ବଲ དିଗ୍ଚ ຖେଶ 1124-1192 年）和咕噜却吉旺秋来讨论，尼玛沃色是五大伏藏王的首位，取出九函《八大法行》等伏藏典籍，称为“上部伏藏”。不过奇怪的是，作为一位伏藏师，尼玛沃色为什么在自己的著作《娘氏教法源流》中却没有提到伏藏传承？同时代的新译派中的桂译师枯巴拉则、萨迦班智达只批评“前期译本是伪造的”，却没质疑伏藏文本的正统性。可见，尼玛沃色所处年代，宗教界对伏藏文本的情况应该还不是太了解。可以确定的是，伏藏文本传承最早始于娘热·尼玛沃色。咕噜却吉旺秋（ མାନ୍ତ୍ରିକ རୂପ སୁର୍ବଲ དିଗ୍ଚ ຖେଶ 1212-1270 年）是第二位伏藏王，他是尼玛沃色之子卓滚·南卡巴的弟子，开取的伏藏文本，称为“下部伏藏”。两位伏藏师是目前记载中最早的伏藏传承，上、下伏藏对在当时宗教影响甚大，路上的修行者相遇时，就相互询问：“你属于上下伏藏哪一个传承？”虽然无法得知何时被称为上下伏藏？从名称看来，下伏藏是相对于上伏藏，咕噜却旺年代较晚，可以合理推断，上、下伏藏应在咕噜却旺的伏藏文本形成后才逐渐出现的。可能因“咕噜却旺伏藏文本在当时宗教界影响较大”，就在当时出现强烈质疑其伏藏文本的言论，同时代的恰译师批判“在桑耶寺等处伏藏邪法，后由咕噜却旺全部掘出的各种伏藏文本”，为了解释回应这类反对内容，咕噜却旺撰写了宁玛派第一部《伏藏教法广史》（ མାନ୍ତ୍ରିକ རୂପ སୁର୍ବଲ དିଗ୍ଚ ）。不过，该书的面世并未平息“质疑伏藏文本真实性”的争论，14 世纪布顿·仁钦珠继续斥责咕噜却旺的伏藏文本是“按他的教谕编造的诸邪法”“所造谎言挖掘于伏藏而造众多邪法”“从伏藏中挖掘出来的教法，则此法亦无灌顶教言的传承”。从“质疑伏藏文本的最早记载”和“为确立伏藏文本传承的正统性的专著”这两点看来，可以确定，在咕噜却旺的年代伏藏法系传承刚开始为当时宗教界所认识，这种认识从质疑批判开始，然而咕噜却旺对于伏藏文本批判声浪的正面回应也对伏藏法系的发展和完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仁增·吉美林巴著，洛珠加措、肖干田译：《涌莲藏真——藏传佛教前译派传承源流》，西藏人民出版社、鹭江出版社，2001：317；松巴堪布·益西班觉著，蒲文成、才让译：《松巴佛教史》，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3：387-388。

³ 哲孟雄现称锡金，地处中国与印度之间喜马拉雅山南麓。藏传佛教中，常描述此地为秘境（秘密处）、空行刹土（空行刹土）与莲花生的伏藏地。有关哲孟雄与秘境、空行刹土、伏藏地的关系，参见许渊钦：《试从伏藏文献解读哲孟雄的起源与特征》，《中国藏学》2013（4）：139-141。

5 列滇杰全名为“仁增列滇敦迥多杰(ིན་增་列་滇·敦·迥·多·杰)”，他被认为是伏藏师仁增贵登的第二世，其兄阿里班钦·班玛旺嘉(අලි ප්‍රතිසාම්පත් කේ-ඩැං-චු-ජා 1487-1542年)亦是当时宁玛派北伏藏法系著名的大学者。列滇杰前往哲孟雄开启圣地之门，在拉日宁波洞中发掘出《寿成就·无死甘露旋》(ཆූ-භා-චු-දා- ອි-ඩැ-ං-ඡෑ-ඛී-ජා)等伏藏法类。索南扎西著《西藏文化》1998: 540。阿旺·索南扎西著《西藏文化》2006: 17。

10 《哲孟雄历代王统史》把哲孟雄的历史分为前弘、中弘、后弘三个时期：前弘期是关于哲孟雄起源记载；中弘期大约在 14 到 16 世纪，有伏藏师仁增贵登、阿里伏藏师仁增列滇杰、噶陀巴·侠拉益西本、门·噶陀巴·索南坚赞、噶陀巴·南卓益西桑布等宁玛派人物在此活动的记载；后弘期是 17 世纪南嘉王朝建立前后的记载。⁴ 2003: 15.

藏法系向喜马拉雅山南麓哲孟雄系统发展的历程。南嘉王朝初期，由于拉尊南卡吉美伏藏法系与卫藏教权中心较为特殊的法脉联系与交往交流，因而对王朝初期的传承结构与宗教格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从上述史实出发，本文提出并尝试回应下列的问题：

首先，在南嘉王朝初期，有哪几支伏藏法系传入哲孟雄？以何种途径在当地传播？法脉传承采行何种继任模式？其次，南卡吉美伏藏法系对哲孟雄的宗教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哪些因素影响了南卡吉美伏藏法系的发展趋势？是否受到卫藏地区宗派的影响？若是没有受此影响，此伏藏法系在境内是单向的发展模式？还是受到影响，形成双边联系的互动模式？宗教发展出现什么转变？形成什么样的格局与特征？本文基于上述问题，试图回应“拉尊南卡吉美伏藏法系对南嘉王朝初期宗教格局的影响”这一论题。对此研究论题，笔者运用哲孟雄出版的藏文文献，在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以南嘉王朝初期哲孟雄的伏藏法系、法系寺院的建构、法脉的继任模式、卫藏与哲孟雄宗派之间的互动影响等为切入点，探讨南卡吉美伏藏法系对哲孟雄的宗教发展格局所造成的影响及其形成特点。研究时间界定落在哲孟雄南嘉王朝初期：从法王升座仪式开始到第六代法王丹增南嘉（བදྱං རେ བྱଶ ཀୁ ལྷ 1769-1793 年）间的 150 年（约从 1642 到 1793 年），这一期间为西藏地方政权和哲孟雄维持传统宗藩关系时期，相当于第五世（1617-1682 年）到第八世达赖喇嘛（1758-1804 年）期间。另外，此研究主题可以突显藏传佛教的一体性与完整性，并为藏文化多元一体的交往交流交融特征提供历史文献的有效证明。

二、宗教新格局的开拓：拉尊南卡吉美伏藏法系在哲孟雄的推行与建构

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中，宁玛派宗教人物创建以传播大圆满及伏藏法系为核心的主寺，主寺建立时间通常都被确立为该宗派发展的起点。宁玛六派中，除了噶陀派的主寺在 12 世纪就已建成外，其他五派主寺建成的时间是从 1632 年最早创建多吉扎寺到 1735

年最晚修建协庆寺的 100 多年间¹¹。这个时期正是宁玛宗派化¹² 极为关键且重要的时期，同时也是格鲁派第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就在这一时期，宁玛派以主寺为中心，依循法系传承的主轴向外传播与扩散，在各地部落信众的支持下建立较小规模的分寺。通过主脉与支脉传承一体性的重要联系，由“中心—六大主寺”向“周边一分寺”扩展宗派影响的发展模式，确立主寺、分寺的从属关系，发展出六大派。

就在固始汗帮助格鲁派消灭敌对势力及宁玛宗派化时期，三位宁玛派大师进入哲孟雄传播宁玛派，同时通过教权合理地赋予了彭措南嘉“法王”世俗政权。从“教权赋予政权”这点看来，法王属于一种“责任的赋予”。从另一方面来说，能以佛法治理哲孟雄，负有保护、发展宁玛派的责任，才能称为“法王（ཆාලුව）”。因此，法王成为哲孟雄宁玛派的倡导者与扶持者，当然，这为伏藏法系在哲孟雄的传播与发展创造了独占优势的局面。三人之中，噶陀·仁增钦波的相关文献记载缺乏，将不列入本文的讨论范围¹³。本文主要讨论的伏藏法系有二：（1）拉尊·南卡吉美所代表的伏藏师贾春宁波（ཀ ར ཤ ཉ ན བ ཉ ད ལ ཉ ཉ ད ཉ ཉ ཉ 1585-1656 年）法系以及他自己开创的哲孟雄伏藏法系（2）阿大·生巴钦波所代表的南哲伏藏师仁增息波林巴（ඇ ད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1524-1583 年）与北伏藏法系。在法王政权的扶植下，南卡吉美和生巴钦波为主的伏藏法系传播主要通过两大途径：一，传法活动。二，修建法系寺院。

11 在宁玛派发展史中，卫藏有两派：1632 年，仁增阿格旺波（ར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1580-1639 年）建立弘扬伏藏师仁增贵登北伏藏（ ཉ ཉ ཉ ）的多吉扎寺（ ཉ ཉ ཉ ཉ ）。伏藏师德达林巴（ ཉ ཉ ཉ ཉ ཉ 1646-1714 年）于 1676 年建立自己伏藏法系的敏珠林寺（ ཉ ཉ ཉ ཉ ཉ ）。康区有四派，噶·当巴德协（ ཉ ཉ ཉ ཉ 1122-1192 年）于 1159 年建立噶陀寺（ ཉ ཉ ཉ ），直到 17 世纪中，伏藏师敦都多杰（ ཉ ཉ ཉ ཉ 1615-1672 年）及其弟子伏藏师龙萨宁波（ ཉ ཉ ཉ 1625-1692 年）的伏藏法系成为噶陀派主要传承。1665 年白玉寺（ ཉ ཉ ）建成，仁增贡桑喜饶（ 1636-1699 年）成为弘扬伏藏师明珠多杰的伏藏法系的第一任寺主。1685 年佐钦白玛仁增（ ཉ ཉ 1625-1697 年）建立佐钦寺（ ཉ ཉ ）。第二世冉江巴·久美根桑南嘉（ ཉ ཉ 1713-1769 年）于 1735 年建立协庆寺（ ཉ ）。两派法系相同，前期属伏藏师尼玛扎巴（ ཉ 1647-1710 年）、后期属伏藏师吉美林巴（ ཉ 1730-1798 年）的伏藏法系。

12 如何定义宁玛宗派化？宗派形成的时间如何确立？伏藏法系对宗派化有什么影响？首先就各宗派形成的时间来说，六大宗派都是创宗者建立以传播大圆满及伏藏法系为核心的主寺，主寺建立时间确立为该派发展的起点。我们若以六宗派建寺时间作为宗派化的起点，噶陀派就成为宁玛派最早的宗派。若以伏藏法系作为宗派化的标志，宗派化的时间应为 1632 年最早创建的多吉扎寺到 1735 年最晚修建的协庆寺的一百年间。结合这两个时间段，宗派化起始于 12 世纪噶陀寺的创建，各宗派的伏藏法系的弘传模式则成熟于 17 世纪，六大宗派最终确立于 18 世纪。

13 噶陀·仁增钦波，又称为“衮度桑布（ ཉ ཉ ）”，他从哲孟雄的西门进入后，在诺布岗附近建立噶陀寺（ ཉ ）。寺旁有一湖泊据说是他以神通力凿开的小湖，称为噶陀湖（ ཉ ），此湖亦是他的魂湖（ ཉ ）。有关噶陀·仁增钦波的文献记载甚少，堪布拉次仁称：“没有他在此地弘法的详细记载。” ཉ 2002: 232.

阿大·生巴钦波是吐蕃王室后代，又称“彭措仁增（ພົມເຈົ້າຕິ່ງທີ່ນັກ）”，“阿大（ອຳນະດັບ）”意为领主，是传自赞普后裔的尊号。他跟随祖父达香间（ພູມ·ມຫາຕັກ）及父亲札西赤赞（ພູມ·ມື່ນ·ຕິ່ງທັກ）学习北伏藏与南哲伏藏师息波林巴的伏藏教法，由祖父特别为彭措仁增举行伏藏法系继承者的升座仪式，同时将来自息波林巴的伏藏宝瓶传给彭措仁增¹⁴。1642年，生巴钦波父子进入哲孟雄后，随即展开建寺传法活动。其在哲孟雄的活动分为两类：一，开展宗教活动：1643年，在玉桑（ຢູ່ມານາວ）举行普巴金刚法会（ວິຫຼຸດສູນ ພຣີ·ດູ້ມະພາດສັກ·ຂອງ·ຜູ້ນາວ），随后在札西町（ນ້າມ·ມື່ນ້າມືດນາ）举行《宁玛十万续》的传法活动。在他的推动下，开创了哲孟雄两项重要宗教活动：（1）将藏地“亿遍玛尼共修法会”（ສຶກທີ່ ປູນ·ສູນ）传统宗教活动引入哲孟雄。他在境内总共举办了五次“亿遍玛尼共修法会”：第一次在玉桑的拉康玛波举行、第二次是在仁钦绷（ຮີດເຄີນ·ສູນນາວ）、第三次是在贝追（ສູນ ສູນ）、第四和第五次都在札西町举行¹⁵。从此之后，“亿遍玛尼共修法会”逐渐成为哲孟雄一项传统活动。（2）开创“饮用尝解脱宝瓶水”（ຫຼັດສູນພູມ·ສູນ) 的宗教活动。这个开创性的宗教活动的重要媒介是伏藏宝瓶（ພົມ·ສູນ），这一宝瓶是生巴钦波传承自伏藏师息波林巴法系的重要伏藏圣物。每年藏历一月八日开始，在札西町举行息波林巴伏藏法《大悲观音·轮回中解脱》（ຂອງນາວ·ຫຼຸດ·ເຄີນ·ສູນ·ດັກ·ດັບ·ຍານ·ສູນ·ຍານ) 法会。藏历十五日清晨开始，给予每一位信众举行宝瓶灌顶与饮用宝瓶水的宗教仪式。时至今日，每年藏历一月十五日来自哲孟雄、不丹以及其他各国游客都到会来到札西町参与这项传统宗教庆典活动¹⁶。二，建立法系寺院：生巴钦波修建驻锡地红殿（ຊັ້ນດັບສັກສູນ），如今当地仍然保存这座寺院的遗址¹⁷。确认了札西町为哲孟雄圣地的中心，并在此修建吉祥善乐殿（ນ້າມ·ມື່ນ·ດີ·ເມີນສານ）。1649年，建立法系寺院压伏寺（ວິຫຼຸດສັກ·ດັບສູນ）。1651年，修建弥勒殿（ວິຫຼຸດສູນ·ມໍລັງ·ນັດ）与白哈（ດູ່ມະນຸດ）护法殿，寺内安奉弥勒佛像，由生巴钦波亲自装藏并进行开光¹⁸。

15 ଅଧିକ ଦେଖନ୍ତୁ: କେଣ୍ଟିରା 2002: 46-47.

纪)、伏藏师贾春宁波、哲列那措让卓(藏文: བྱଲେ ན རྩୋ གླୁ ཆ གླୁ ཉ གླୁ ཉ གླୁ ཉ 约 17 世纪)等高僧, 成为当时颇负盛名的宁玛派大师, 有新伏藏(藏文: མྱତ୍ର ཉ གླୁ ཉ གླୁ ཉ)、净显(藏文: ད୍ୱ୏ ཉ གླୁ ཉ)、意伏藏(藏文: ད୍ୱ୏ ཉ གླୁ ཉ ཉ)三种特殊的教法传承¹⁹。他前后六次修复桑耶寺并举行开光, 前往印度朝圣期间展现许多神通事迹, 使得一位印度国王转信佛教²⁰。由于他在哲孟雄弘传大圆满, 被誉为“哲孟雄大圆满宗主(藏文: མྱତ୍ର ཉ གླୁ ཉ གླୁ ཉ ཉ ཉ ཉ)”²¹, 他的宗教影响力来自他本人的高深修为及其对宁玛派整体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直接影响宁玛派中敏珠林、佐钦两派传承体系的发展。南卡吉美分别将阿努瑜伽与大圆满的传承汇入了敏珠林、佐钦两派: 一, 在敏珠林派阿努瑜伽《密意集合经》(藏文: ང ཉ གླୁ ཉ ཉ ཉ ཉ)灌顶传承体系中的康派传承(藏文: མྱତ୍ର ཉ གླୁ ཉ)为: 南卡吉美→桑达·程列伦珠(藏文: མྱତ୍ର ཉ གླୁ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17 世纪)²²→桑达之子敏珠林派的开创者德达林巴²³。二, 在佐钦派的大圆满体系中, 以上师心滴(藏文: ང ཉ གླୁ ཉ ཉ ཉ)为主的宁体母子传承: 南卡吉美→佐钦巴·隆佐塔哲(藏文: ང ཉ གླୁ ཉ ཉ ཉ ཉ ཉ 17 世纪)→佐钦派的开创者白玛仁增²⁴。1646 年, 伏藏师贾春宁波与伏藏师敦都多杰依伏藏授记指示南卡吉美: “前往哲孟雄开启秘境哲孟雄的圣门与开取哲孟雄的伏藏、修塔建寺等利益西藏的事业。”²⁵

19 ଶ୍ରୀନାଥ୍ ପାତ୍ର 2003: 37.

²⁰ 藏文《藏族人名大辞典》(甘南藏族自治州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35页。

21 ମୁଖ୍ୟ ଶାଶ୍ଵତ ପରିଷକ୍ଷଣାବ୍ୟବରେ ଶିଖିତ ହୁଏକି ମୁଖ୍ୟ ଶାଶ୍ଵତ କଣ୍ଠାବ୍ସର୍ବାଦୀ ଶିଖିତ ହୁଏକି ମୁଖ୍ୟ ଶାଶ୍ଵତ କଣ୍ଠାବ୍ସର୍ବାଦୀ । ଶିଖିତ ହୁଏକି ମୁଖ୍ୟ ଶାଶ୍ଵତ କଣ୍ଠାବ୍ସର୍ବାଦୀ । 1996: 490.

22 程列伦珠生于洛扎，依止父亲东昂滇增、第三世贝林·慈诚多杰、拉尊·南卡吉美、佐千巴·南卡珠扎、贡饶大译师贤遍多杰等大师，他在卫藏、不丹等地事业广大，其主要弟子是敏珠林寺的德达林巴。詳見：
程列倫珠（1720—1780）. 《西藏傳記》. 西藏文獻出版社，2002年，頁387-393。

24 ମହାକୁଣ୍ଡଳୀଙ୍କ ପରିଶ୍ରମରେ ଆମାଜନ୍ ଏବଂ ବିଶ୍ଵବିଦ୍ୟାଳୟରେ କେତେବେଳେ 2004: 193.

后，举行了 21 天的开光法会²⁷。同年，在法王彭措南嘉与当地信众请求下，建立了哲孟雄第一座寺院。在伏藏的叙事中，伏藏授记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指示，指导了伏藏师应该行持的特殊宗教事业。《圣地志》中有一段有关伏藏授记与修塔建寺关系的描述：

此时，法王彭措南嘉及僧众等一同祈请，说：“喇嘛仁波切（南卡吉美）！如同往昔噶当派的格西或密勒、喀拉（恭琼）、洛（日巴）果（仓巴）的传记中所载，他们经常游历各地，没有固定处所，却能无误地安置上、中、下根器之众生于成熟解脱之道，恩德甚大！就如同花生不断教敕浊世众生当前往秘境圣地，现在我们应当祈请在此处圣地建立一座修行驻锡地。况且在伏藏授记中：‘在此地修寺、造塔、建修行处，藏地百年之中将安乐。’往昔证地者虽已断除我执，现在于此地建寺，无论如何应当修建。”一再请求下，（南卡吉美）修建了寺院。²⁸

27 རྒྱྲ་ୱ୍ୱାଙ୍ମେ ༂ ད୍ୱାରା ପ୍ରକାଶିତ ପାଠ୍ୟ ବିଷୟରେ ଏହାର ପ୍ରକାଶନ କରିଛନ୍ତି ଏହାର ପାଠ୍ୟ ବିଷୟରେ ଏହାର ପ୍ରକାଶନ କରିଛନ୍ତି ଏହାର ପାଠ୍ୟ ବିଷୟରେ ଏହାର ପ୍ରକାଶନ କରିଛନ୍ତି 2003: 48-49, 117-118.

遵循过去的传统，此寺的僧众、密咒师在整个社会名声威望较高，具有“扎仓巴（ဇားဆုံးပါ）”特殊称号。此寺每年举行重要的宗教庆典，特别是与王室相关的各项宗教活动皆由贝玛扬哲寺的金刚上师、僧众主持，这已成一种惯例³⁰。

比较上述两者传播的路径、范围与对象，不难发现：一，南卡吉美是莲花生授记的伏藏师，“完成伏藏授记的宗教活动—开取伏藏”是他进入哲孟雄的主要目的与职责。在此活动的轨迹基本上是以授记的指示为主轴进行：举行法王升座典礼→修建吉祥威光塔→开取伏藏→伏藏法系的传法活动→修建法系寺院。其主要活动范围不大，只在北方诺布岗、圣洞拉日仁钦宁波、珠第寺、札西町到贝玛扬哲寺等玉桑附近地区活动。传法对象以法王、喇嘛等藏族上层精英阶级为主。在达成“伏藏授记”的任务后，就返回西藏。二，与此不同，阿大·生巴钦波父子移居哲孟雄，并没有返回西藏的计划。“定居哲孟雄地”为在当地推行、发展伏藏法系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们在此地的活动轨迹：确认圣地哲孟雄的中心札西町→修建吉祥善乐殿→压伏寺→弥勒殿→举行《宁玛十万续》的传法活动。活动范围较为广泛，以札西町为根据地，从玉桑到贝追、仁钦绷间。传法对象的普及度较高，传法活动是以人人皆可参与的基础性活动“亿遍玛尼共修法会”与“饮用尝解脱宝瓶水”为主，这已成为哲孟雄的传统宗教活动。

值得注意的，有以下有三点：第一，南卡吉美与生巴钦波在哲孟雄建寺传法，实际上是把伏藏法系的传法活动从卫藏、康区转移到哲孟雄，推动了宁玛派伏藏法系南向传播与扩散。第二，从宁玛派整体发展史与哲孟雄地方史来看，南卡吉美不仅是宁玛派大圆满传承的重要宗教人物，而且在哲孟雄广泛传播大圆满，成为哲孟雄大圆满宗主。另外，他在哲孟雄开取伏藏，建立属于哲孟雄本地的伏藏法系。这两点说明南卡吉美对哲孟雄宁玛派发展起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也可以说，他是当时哲孟雄宗教界最重要、最权威的人物。第三，生巴钦波的记载未见于宁玛派整体发展史，只出现在哲孟雄地方史中。其宗教的重要影响力是“最早在哲孟雄开展宗教活动”，哲孟雄历史学家堪布拉次仁评述说：“阿大生巴钦波是最早在哲孟雄传播伏藏法系的开宗立派者。”³¹

由上可见，南嘉王朝初期，宗教传播对象缺乏普遍的信仰基础，传播地域也缺乏广泛性，伏藏法系在哲孟雄社会中的发展属于初期阶段。从拉尊南卡吉美拥有“哲孟雄大

圆满宗主”与“哲孟雄伏藏的开取者”的重要宗教身份及修建哲孟雄第一座寺院、佛塔的史实看来，历史文献以“拉尊南卡吉美伏藏法系”为轴心进行叙事。此外，在现今哲孟雄寺祖师像的排列顺序中，拉尊南卡吉美位于最重要的位置，升座典礼法座也是拉尊南卡吉美的法座最高，表明当时在哲孟雄他具有最重要的宗教地位。因此可以说，南嘉王朝初创时，宁玛派伏藏法系在哲孟雄的传播是当时宗教发展的新趋势。在这一基本趋势中，显然，法王政权选择以拉尊南卡吉美的伏藏法系作为哲孟雄宗教发展的主轴，开拓了哲孟雄宗教新格局。

三、中心与地方：卫藏宗派扶植下，拉尊·南卡吉美伏藏法系在哲孟雄地方的发展

在宁玛派发展史中，法脉继任基本可以归纳为三种模式：（1）师徒继任制；（2）家族继任制；（3）转世继任制。在宁玛派的座主继任模式中，早期主要是采行家族继任与师徒继任的双轨制。后来，随着宁玛宗派化的发展，才开始逐渐采行转世继任座主的制度。就“六大宗派的座主采用转世系统的时间点”来说，最早从17世纪中期多吉扎派确立“仁增钦波（ရི་ණ·འཇིག·ཆེན་པོ）”的转世系统开始到18世纪末白玉派最后开启该派首位转世系统“噶玛古钦（ཀརྩ་མ་ཆེན）”之间的150年，除了敏珠林派采行子嗣继任座主外，其它宗派的座主皆逐步转向转世继任制³²。转世继任制具有延续法脉稳定性的特点，确保了主寺创建者的转世就是该宗派中最高活佛的宗主地位，同时符合世代信奉寺

32 就“宁玛派六大宗派的座主采用转世系统的时间点”来说，多吉扎派的创建者仁增阿格旺波（1580-1639年）圆寂后认证其转世白玛程列（1641-1717年），开启“仁增钦波”的转世系统。敏珠林寺的继任方式，长子继任座主（ସିକ୍ଷେତ୍ର），次子出家继任堪钦（ଆଧୁନିକ୍ଷେତ୍ର），属子嗣继承制。从噶陀派1159年建立，至17世纪中期约500年间，是以师徒相承的十三代上师（ସ୍ଵର୍ଗାସ୍ତୁଣ୍ଡାସ）与家族传承的十三代仲巴（ହୃଦୟାସ୍ତୁଣ୍ଡାସତ୍ତବୀ）的座主继任制。17世纪中叶，伏藏师龙萨宁波（1625-1692年）之子嘉色·索南德赞（ମନ୍ଦିରାସ୍ତୁଣ୍ଡାସତ୍ତବୀ 1670-1723年）继任寺院座主，他圆寂后认证其转世，成为该派第一位转世活佛“直美信雄（ଶ୍ରୀଅନ୍ତିମଶ୍ରୀରୂପ）”的开启者。白玉寺从1665年建寺到18世纪末的100年间，采用师徒继任座主。直到认证第四任座主噶玛札西（ଗାମାଚାର୍ଜୁଣ 1728-1790年）的转世噶玛久美（ଗାମାଚାର୍ଜୁଣ 1794-1851年），开启白玉派的转世制度。佐钦寺创建者佐钦巴白玛仁增圆寂后，他的两大弟子本洛·南卡俄萨（ମନ୍ଦିରାସ୍ତୁଣ୍ଡାସତ୍ତବୀ?-1726年）与冉江巴·滇贝坚赞（ମନ୍ଦିରାସ୍ତୁଣ୍ଡାସତ୍ତବୀ 1650-1704年）先后继任座主，很快认证白玛仁增的转世久美帖秋丹增（ଶ୍ରୀଅନ୍ତିମଶ୍ରୀରୂପ 1699-1758年），开启“佐钦仁波切（ଶ୍ରୀଅନ୍ତିମଶ୍ରୀରୂପ）”的转世系统。冉江巴圆寂后，第二世佐钦仁波切的亲弟久美根桑南嘉（ଶ୍ରୀଅନ୍ତିମଶ୍ରୀରୂପ 1713-1769年）被认证为冉江巴转世，开启“协庆冉江（ଶ୍ରୀଅନ୍ତିମଶ୍ରୀରୂପ）”的转世系统，后第二世冉江于1735年（1713-1769年）建立协庆寺，以寺名为派名发展出协庆派。综上所述，除了敏珠林派采行子嗣继承来传承法脉，从“最早17世纪中叶多吉扎派白玛程列被认证”到“最晚18世纪末白玉派噶玛久美被认证”的150年间，宁玛各宗派皆转向转世继承模式。

院活佛的部落家族的期望。这种具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宗派发展模式，促进了宁玛宗派化的发展进程。

伏藏法系在哲孟雄的发展动力是建立在法系传承的继任模式、法系寺院体系的形成、法系传法活动等制度化的基础上。毫无疑问，为促进哲孟雄伏藏法系自身结构长期发展的稳定性与管理的有效性，必须在教义内容、宗派归属、继任方式、主分寺关系等方面与卫藏宗派中心相结合、相适应，才能建构起一种促进宗教稳固发展的最佳途径。南嘉王朝初创时期，伏藏法系的继任模式基本上依循师徒继任与子嗣继任两种方式，以确保寺院法脉传承的永续发展。其中，阿大生巴钦波伏藏法系传承是以子嗣继任寺主的方式：阿大生巴钦波→蒋巴丹增（ওঁবাৰ্দ্ধন চন্দ্ৰসেন্দ্ৰিয়）→阿大仁钦贡（ওঁবাৰ্দ্ধন সদ্বিৰুক্ত কেৰুণীকুমাৰ），其传承法系只记载到他的孙子仁钦贡，因此本节不予讨论。继任形式的重大转变是南卡吉美伏藏法系开始采行的转世继任制。1652年南卡吉美圆寂后，在其日、月两大高徒之一却英伦珠（ছেঁ-দ্রুণ-শুণ-শুণ）的请求下，第五世达赖喇嘛认证南卡吉美的转世，为其剃发并赐名“阿旺根桑吉美（ওঁবাৰ্দ্ধন সদ্বিৰুক্ত পতেন্দ্ৰিয়ান শেন্দ্ৰিয়）”，在哲孟雄出现第一位转世活佛，形成拉尊南卡吉美转世系统。以下就师徒继任转向转世制度的过程，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一，卫藏中心宗派的扶植情况：南卡吉美历代转世的认证关系、师承宗派、法系传承等与第五、第六、第七世达赖喇嘛的关系。二，南卡吉美伏藏法系在哲孟雄地方的发展：第二世到第五世南卡吉美在哲孟雄的宗教活动。

一，卫藏中心宗派的扶植情况：在宁玛派发展史中，伏藏法系的传承主轴分为家族传承与转世传承两种。17世纪中叶开始，伏藏法系的创建者开始被认证为转世活佛以继承法脉。与此相同，南卡吉美的转世活佛即是其法系的主要继承者。拉尊南卡吉美圆寂后，第五世达赖喇嘛认证出生于竹域（不丹）苯塘的查通·弥觉多杰（ছাতন শ্রী মিজুদোঁজ |1656-1675 年）为第二世活佛，从此开启南卡吉美的转世系统。此外，弥觉多杰还跟随多杰扎派仁增钦波白玛程列、敏珠林派堪钦罗钦达玛师利学习。不过，由于他较早圆寂³³，第五世达赖喇嘛为此特别举行两次迅速转世的祈愿法会³⁴。从“五世达赖喇嘛认证”及“因圆寂举行两次迅速转世的法会”这两点看来，第五世达赖喇嘛非常重视南卡吉美伏藏法系及转世继承者。事实上，第五世达赖喇嘛与拉尊·南卡吉美有着法脉相承的师徒关系，《哲孟雄历代王统史》中记载：

抵达藏地后，拉尊向第五世达赖喇嘛传授以《持明命修》为主、《啥吽》相关的长寿修法等口诀，并授他为法主。第五世达赖喇嘛也（向拉尊）示现希有神变并传授口传深法。因此，（对拉尊）心生信心，（拉尊）成为第五世达赖喇嘛的上师。³⁵

对比前、后世的认证关系和师承宗派、法系传承，有两点值得注意的：一，拉尊南卡吉美转世系统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建立在第五世达赖喇嘛与拉尊南卡吉美法脉继承的师

³⁷ 拉尊南卡吉美日月两大弟子之一领主却英伦珠的转世。

徒关系上，再由卫藏教权中心的第五世达赖喇嘛直接介入、确立而形成的转世系统。转世系统并非哲孟雄内部自主寻找、认证而形成的。二，第二世、第三世、第四世活佛与第五世、第六世、第七世达赖喇嘛有着认证、受戒、学法等师徒相承的重要关系，在此期间，双方形成了一种历代师徒相承的宗教惯例。三，历代活佛都非出生于哲孟雄，都在宁玛派卫藏教法中心敏珠林寺和多杰扎寺完成佛学教育。法系传承以南卡吉美伏藏法系为主，兼具北伏藏法系、敏珠林伏藏法系。

二，南卡吉美伏藏法系在哲孟雄地方的发展。在第二任法王滇松南嘉（བྱନླྰ ར୍ତ୍ତୁ ས୍ଵାମୀ 1644-1699 年）统治期间，第二世被迎回哲孟雄。关于第二世何时进入哲孟雄？停留多久？史籍中并无记载，只载明第二世活佛年轻圆寂⁴¹。“年轻圆寂”这一点说明了二世在哲孟雄没有广泛的传法活动。第三世活佛吉美巴沃在王子恰多南嘉（ཕྱା ཚ ད ག ན བ ཉ ཁ གྷ ང 1686-1717 年）⁴² 的邀请下，前往哲孟雄传法。《空行刹土哲孟雄顶严化身四瑜珈士及其持有者之传承源流》中，有一段描述敏珠林派伏藏师久美多杰劝导弟子吉美巴沃前往哲孟雄传法的描述：

由于哲孟雄王子恰多南嘉下令，佐钦活佛（吉美巴沃）应立即前往！过去蒙古军队入侵导致藏地不安，当时根桑南嘉（拉尊南卡吉美）为了利益藏地的教法与众生，前往秘境哲孟雄，开启圣地之门，因此雪域渐转安乐。恰多南嘉是受莲花生所加持护持佛教的法王，对大伏藏师（我久美多杰）也具足坚固的信心。（前往哲孟雄之事）不可推拖。⁴³

可见继承前世宗教事业是转世活佛的主要责任，第三世通过转世继承前世伏藏法系与哲孟雄法系寺院，应承担对哲孟雄法系寺院、当地信众等利益佛教事业。先前王子恰多南嘉因法王继承问题无法返回哲孟雄，在西藏地方政府调解下，1709 年吉美巴沃陪同

41 ଅଧିକାରୀଙ୍କର ଦରଶି ଶାଖାଯୁଦ୍ଧରେ କଷଣ ଶିଳ୍ପିଦର୍ଶନ କେତ୍ତାନ୍ତରେ ହିନ୍ଦୁରେ ଦିଲ୍ଲିକାରେ ଥିଲା 2003: 120.

42 姐姐奔丹旺姆（ବନ୍ଦିନ୍ଦନାଶିରାଲୁଙ୍କାରୀ）不满由其弟恰多南嘉继承法王，在竹域（不丹）德布（ଶିଥିନ୍ଦନ）的支持下，派遣阿旺程列（ଏଣ୍ଡରାଜାଶିରାଲୁଙ୍କାରୀ）与彭列（ଏଣ୍ଡରାଜା）率军入侵哲孟雄。公主奔丹旺姆与竹域军队的合谋控制哲孟雄政权长达五、六年。ଅଧିକାରୀଙ୍କର ଦରଶି ଶାଖାଯୁଦ୍ଧରେ କଷଣ ଶିଳ୍ପିଦର୍ଶନ କେତ୍ତାନ୍ତରେ ହିନ୍ଦୁରେ ଦିଲ୍ଲିକାରେ ଥିଲା 2003: 125.

43 原文为：ଏଣ୍ଟାର୍କାନ୍ତରେ କଷଣ ଶିଳ୍ପିଦର୍ଶନ କେତ୍ତାନ୍ତରେ ହିନ୍ଦୁରେ ଦିଲ୍ଲିକାରେ ଥିଲା 2002: 159。见 ଅଧିକାରୀଙ୍କର ଦରଶି ଶାଖାଯୁଦ୍ଧରେ କଷଣ ଶିଳ୍ପିଦର୍ଶନ କେତ୍ତାନ୍ତରେ ହିନ୍ଦୁରେ ଦିଲ୍ଲିକାରେ ଥିଲା 2002: 159。

恰多南嘉返回哲孟雄⁴⁴。第三世活佛在哲孟雄的活动主要为传法活动与修复寺院：一，新建、修复法系寺院。不丹军队入侵哲孟雄期间（1700-1705年），破坏了寺院与舍利塔，吉美巴沃修复法系寺院桑阿却林、珠第寺与札西町附近的舍利塔，新建耶桑息德寺。二，传法活动方面，吉美巴沃从1709年到1735年间，在哲孟雄共有七次传法活动，其中传授大圆满有五次、南卡吉美伏藏法系六次、北伏藏法系一次、敏珠林伏藏法系一次⁴⁵。第三世活佛多次往返西藏、哲孟雄两地，传授拉尊南卡吉美的伏藏法系，在藏、哲二地具较高的宗教地位。从这点看来，传承伏藏法系的确是南卡吉美转世活佛的主要目的与宗教任务。第三任法王逝世后，年仅10岁的久美南嘉（*ബୁଦ୍ଧ କ୍ରି କ୍ରମ ଶ୍ରୀ ନାମ ପାତ୍ର* 1707-1733年）继任法王，当时第三世活佛吉美巴沃宗教声望最高，被选为法王摄政，成为哲孟雄的政教领袖，他把哲孟雄与宁玛派伏藏法系政教利益深度地联系一起。第四世活佛在第五任法王南嘉彭措（*କ୍ରମ ଶ୍ରୀ ସୁରାଚେଣ୍ଟା* 1733-1779年）统治时期，被迎回哲孟雄，在各处圣地朝圣与修行，不久后圆寂⁴⁶。第五世活佛从西藏至哲孟雄后，指导修法仪式，建立宗教规章制度，有一系列传法活动⁴⁷。第五世之后的拉尊转世世系不见于史料记载。事实上，从第三世活佛吉美巴沃以后的转世记载已相当匮乏。

对比南卡吉美历代转世在哲孟雄的宗教活动，有两点值得注意：一，从“第二世年轻圆寂”“第四世在哲孟雄各圣地修行”“第五世只有一系列传法活动”这三条记载来看，第二世、第四世、第五世在哲孟雄没有大规模、大范围的宗教活动，对于哲孟雄伏藏法系的传播与发展的影响是有限的。二，宗教上，第三世活佛在哲孟雄的七次传法活

44 ଜ୍ଞାନକୁମାର ମହାନାଥ କଣ୍ଠା କ୍ରମ କ୍ରମ ମହାନାଥ 2003: 69.

45 (1) 第一次：1709年，应第三代法王恰多南嘉与贝玛扬哲寺僧众邀请，传授了伏藏师咕噜却旺的《上师密集》、仁增贵登的《意成就·愤怒力》、拉尊南卡吉美的《持明命修》以及敏珠林伏藏师久美多杰的伏藏全集。(2) 第二次：在吉美巴沃朝圣后回到贝玛扬哲寺时，向堪布罗贝多杰与贝玛扬哲寺僧众传授《娘氏八大法行·善逝总集》的灌顶与《大藏经》的口传等。(3) 第三次：1714年向珠第寺、敦炯寺、拉渴寺、贝玛扬哲寺的活佛、僧众传授南卡吉美的《持明命修》教授。同年，从藏历三月到五月期间，在桑阿却林寺向法王恰多南嘉传予《金刚心要》《大圆满应成续》《上师心滴》等法。(4) 第四次：吉美巴沃与敏珠林寺主德达林巴之女敏久巴准（*ଶିବ ବୁଦ୍ଧ କ୍ରି କ୍ରମ ଶ୍ରୀ ନାମ ପାତ୍ର* 1699-1769年）相互传法，敏久巴准传予吉美巴沃《上师心滴》、《空行心滴》的灌顶，吉美巴沃传予敏久巴准《持明命修》的灌顶。(5) 第五次：1727年在珠第寺传予《三宝总摄》《持明命修》的灌顶，传予堪布罗贝多杰《持明命修》、《七宝藏》灌顶与讲解。(6) 第六次：1734年在堪布罗贝多杰的请求下，传授《大幻化网·秘密藏》《阿努瑜伽·密意集合经》的灌顶及修行教授。(7) 第七次：1735年在桑阿却林寺传予珠脱罗滇巴《上师心滴》《无垢心髓》的灌顶。*ଅଧିକାରୀ ଶିବ ବୁଦ୍ଧ କ୍ରି କ୍ରମ ଶ୍ରୀ ନାମ ପାତ୍ର* 2002: 159-185.

46 *ଅଧିକାରୀ ଶିବ ବୁଦ୍ଧ କ୍ରି କ୍ରମ ଶ୍ରୀ ନାମ ପାତ୍ର* 2003: 158.

47 *ଅଧିକାରୀ ଶିବ ବୁଦ୍ଧ କ୍ରି କ୍ରମ ଶ୍ରୀ ନାମ ପାତ୍ର* 2002: 194.

动中，传授六次前世南卡吉美伏藏法系的教法，对南卡吉美伏藏法系在哲孟雄的发展发挥了关键性的重大作用。在政治上，第三世代理法王摄政，维持哲孟雄的政权稳固和社会稳定发展。从这两点来说，在整个转世世系中，第三世吉美巴沃是历代转世系统中对哲孟雄政教最有影响力的活佛。

上述内容说明了两点：第一，在卫藏中心的政教首领五世达赖喇嘛的扶植下，拉尊南卡吉美伏藏法系的继任模式从师徒继承转向转世继承，这一模式的转变，使得第二世、第三世、第四世的活佛首先都在卫藏中心宁玛派的多杰扎寺与敏珠林寺学习前世的伏藏法系后，再前往哲孟雄传播教法。南卡吉美伏藏法系从原本以哲孟雄为重心的传播脉络转入继任方式、寺院建构、传法活动等制度化的宗派之中。在《哲孟雄寺院历史》中，说明了伏藏法系归属宁玛宗派的情况：“拉尊传规属敏珠林派，阿大生巴钦波传规属多杰扎派。”⁴⁸ 伏藏法系归属宁玛六派的宗派化趋势，是在宁玛宗派化及采行转世制度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第二，伏藏法系归属宗派后，从卫藏中心的宁玛两大派敏珠林、多杰扎向地方哲孟雄普遍转移伏藏法系，促进哲孟雄法系传承的持续发展。可以认为，在哲孟雄宗教发展过程中，其伏藏法系持续与卫藏中心宁玛敏珠林、多杰扎两派间发生相互适应、相互融合，这种双向的交流互动的发展模式，使得藏传佛教宁玛派的教义内容与传播发展形式逐渐地根植于哲孟雄的土壤之中。

四、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的认识：

第一，南嘉王朝初期，宁玛派伏藏法系在哲孟雄的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发生了两个重大转变：（1）伏藏法系由过去师徒继承与子嗣继承的继任模式发生了变化，开始出现转世继任制。哲孟雄第一个活佛转世系统的形成是受到卫藏教权中心五世达赖喇嘛的介入、确立而促成的。（2）宁玛宗派化及采行转世制度的过程中，各支伏藏法系逐步归入各派的传承法脉之中，各宗派建构出各具特色的教育制度、修行体系、活佛世系等模式以促使整体宗派的兴盛发展，同时肩负促进分寺各项宗教发展的义务与责任。宁玛六派形成后，导致哲孟雄的伏藏法系从单一结构的发展模式向整体系统性发展模式的转变。

48 詹·扎西平措著《南卡吉美伏藏法系研究》，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第二，伏藏法系传入哲孟雄后，传播的内容与形式开始发生变化。这一过程持续了150年，这一期间在卫藏教法中心第五世、第六世、第七世达赖喇嘛与宁玛敏珠林派、多杰扎派的扶植下，促使伏藏法系逐步渗入哲孟雄社会。这并非是在哲孟雄境内自主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卫藏教法中心的支持与推动下形成的藏哲双向交流互动的发展模式。

卫藏与哲孟雄之间的宗教发展并不是相互毫无关联的割裂状态，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法系继承的重要关系，这个关系表现在两点：一，法脉传承是两地宗教发展的重要纽带：从拉尊南卡吉美到第五世活佛皆与第五世、第六世、第七世达赖喇嘛有着传承伏藏法系、认证转世活佛、受戒赐名等法脉相联的师徒关系。二，伏藏法系归属于宁玛派的宗派中：由卫藏中心敏珠林派、多杰扎派主寺指导、提供哲孟雄地方分寺各方面宗教事务的协助与传承法脉的交流，使得南卡吉美伏藏法系归入敏珠林派，阿大生巴钦波伏藏法系归入多杰扎派。从上述伏藏法系的相互联系、主寺分寺的互动模式及转世继任模式深受卫藏教法中心影响的实情看来，各宗派、各法系并非是彼此藩篱的割裂关系，而是呈现出宗教文化多元一体的密切关系。

◆ 许渊钦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

ABSTRACTS

Note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Dharmacakrapravartanasūtra* and Related Texts

Saerj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various narratives and related works on the Buddha's first discourse on turning the wheel of the Dharma, this paper surveys cognate descriptions in different Buddhist traditions. It especially focuses on two Tibetan texts entitled the *Dharmacakra (pravartana) sūtra* that are preserved in the Kanjur. The essay points out that one work, the **Dharmacakrasūtra*, is not an independent translation, but an extract from the *Samghabhedavastu* of Mūlasarvāstivāda Vinaya. Yet another work, the **Dharmacakrapravartanasūtra*, reflects the influence of Theravāda Buddhism. The paper aims to provide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the redaction, transmission, and translation of the *Dharmacakrapravartanasūtra* and related works.

A Glimpse of the Battle between Tang and Tubo in the Middle Kaiyuan Period: Details from the Excavated Epitaphs

Wei Yingchun and Ma Zhenying

(Institute of Dunhuang Studies of Lanzhou University)

The paper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four newly unearthed epitaphs related to Hexi 河西 in Tang Dynasty, while making references to historical records, Dunhuang manuscripts, Tibetan literature and other records, it aims to reproduce several details of the battle between the Tang and Tubo in the middle Kaiyuan period. The Battle of Yumen 玉门 between the Tang and Tubo was recorded in the “epitaph of Li Li” 李礼墓志, which has not been attested elsewhere. The “epitaph of Yu She” 鱼涉墓志, records the tragic battle between the Tang and Tubo in Qilian City 郊连城, and that the tomb owner Yu She died on the day of victory, which can be supplemented with the official historical record.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contained in epitaphs may be helpful to the futur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ng and Tubo as well as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elong 河陇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Epitaph of Zhao Hong'an and Tang Jiuzheng's Southern Expedition ——On the Tang-Tubo Relations during the Reign of Tang Zhongzong

Yuan Enda and Lu Li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Tang Jiuzheng's 唐九征 southern expedition was a military campaign in the southwest of the Tang Dynasty during the period of Tang Zhongzong (r.705-710). The historical records pertaining to these events are relatively brief and often contradictory, leaving gaps in our understanding. But the epitaph of Zhao Hong'an 召弘安 housed at the Tang West Market Museum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for addressing these issues.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his epitaph, it becomes apparent that the primary target of Tang Jiuzheng's southern military campaigns was the tribal groups in the Yaozhou 姚州 region, roughly corresponding to present-day Yao'an County in Yunnan Province. These expeditions had limited, direct involvement with Tubo. Furthermore, during the southern expedition of Tang Jiuzheng, both the Tang and Tubo made concessions to maintain their relationship, but the Tibetan side made larger concessions than the Tang. This suggests that, despite the restoration of peace between the Tang and Tubo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Zhongzong, Tubo was still in a relatively dis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their practical interactions.

An Exploration of Reasons of Geshu Han's Recapture of Shibaocheng

Li Xuedong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In the twenty-ninth year of Emperor Xuanzong's reign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741), Tubo launched an attack on Shibaocheng 石堡城. Recognizing its crucial strategic importance, starting from the fourth year of the Tianbao era (745), the Tang court successively appointed Huangfu Weiming 皇甫惟明, Wang Zhongsi 王忠嗣, and Geshu Han 哥舒翰 to lead military campaigns to manage Shibaocheng. Ultimately, Geshu Han defeated the Tibetan forces and brought Shibaocheng back under Tang control. During Tianbao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there was an increasingly intens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Prime Minister Li Linfu 李林甫 and Crown Prince Li Heng 李亨. Although Huangfu Weiming and Wang Zhongsi were loyal to the Crown Prince and were stationed in the borderlands, they could not stay aloof from the political turmoil. The successive military campaigns launched to recover Shibaocheng were affected by the power struggle at the imperial court, resulting in Tang forces returning without success. Geshu Han, as an outsider of the court politics, due to his background as a minority leader, was able to avoid the detrimental influence of the central power struggle on frontline military operations. Additionally,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cipating general Abusi 阿布思 and Li Linfu shielded this campaign from the effects of political rivalries. Furthermore, Geshu Han had a relatively strong military force when he attacked Shibaocheng. The Tang army had already launched an offensive against Momi Cheng in Jiannan which distracted Tibetan forces and provided support for Geshu Han's campaign to retake Shibaocheng. This strategy ultimately led to the successful recovery of Shibaocheng. After the battle, Geshu Han gradually built a defensive system centered around Shibaocheng, thereby strengthening its defenses.

A Study of the Official Position of Ngan lam Stag sgra Klu khong

Zhang Xu and Zheng Hongxiang

(School of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Silk Road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Ngan lam Stag sgra Klu khong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a series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Tang Dynasty and Tibet, making him an influential figure during the later period of Tang-Tibetan relations. According to the *Zhol* Pillar, Klu khong's rise in government positions was marked by a series of promotions due to his role in reporting and suppressing rebellions. He was initially appointed as *nang blon* and later promoted to the positions of *nang blon chen po* and *yo gal 'chos pa chen po*. But Klu khong faced a challenging path to his advancement, as he did not come from a noble background and adhered to the Bon religion, which created obstacles for his career. Despite the triumph of the capture of Chang'an, Klu khong did not receive further promotions and, in fact, experienced a prolonged period of stagnation in

his official career. Over a decade later, he reemerged in the public eye and assumed the positions of *nang blon* and *yo gal 'chos pa*, holding one of the highest-ranking positions in the Tubo court, second only to the *Blon chen*. This was the highest office he held throughout his career, as he never served as the *Blon chen*.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Madhyamaka Tenets in the Treasure Text Titled *Gsang sngags lung gi bang mdzod*

Yang Jie

(Re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ng crucial for the study of the early period of treasure tradition, Nyang ral Nyi ma 'od zer and his famous treasure cycle *Bka' brgyad bde gshegs 'dus pa* have drawn considerable attention from quite a few scholars. Following in the steps of earlier research that has illuminated the origins of some of the tantric texts in this cycle, the author focuses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Madhyamaka tenets within the *Gsang sngags lung gi bang mdzod* — a doxographical work that also belongs to this cycle.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ies, what becomes clear is that this classification has its Indian precedent and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doxographical background of Nyang ral's time. In the author's view, this nominally revealed treasure text obviously absorbs the doxographical framework prevalent during the early *phyi dar* period, and is quite important for our further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doxography of that period.

Gri gum btsan po and the Bon Treasure Historical Narrative: An Analysis of Sga ston's (14th C.) *History of Bon Treasure*

Naljor Tséring

(Doctoral Student,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PSL, CRCAO)

The treasure text or *gter ma* is a cultural phenomenon that is mainly popular in the Buddhist Nyingma school and the Bon tradition in Tibet. Bon *gter ma*-s began to emerge in the 11th century, and a special historical narrative regarding their burial, discovery, and transmission already took shape in the 14th century. The origin of a given *gter ma* and the reason for its transmission usually constitute the very first topics to be explained in these narratives. Regarding these topics, Nyingma scholars usually provide the story of Padmasambhava a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for the formation of Tibetan Buddhist *gter ma*-s whereas the Bon tradition connects its origin to the two transition periods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Tubo period (also known as the two “extinction periods” in the history of B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first extinction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the Bon, that is, the story of the eighth king *Gri gum btsan po*, as a case study and explores how the later generations of Bon scholars use legends and stories regarding the period of the Tibetan Empire to construct *gter ma*-origin stories for their own tradition. Furthermor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is story, we can understand how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of the Bon *gter ma*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Bon doctrinal knowledge system and the inspiration it received from the Buddhist narrative (on the “extinction of dharma”), while inheriting many unique indigenous elements and cultural contexts.

从娘热·尼玛沃色所掘《八教善逝集》来看早期《四普巴续》及其与远传法及伏藏法统之间的关系

凯西·坎特维尔

(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波鸿鲁尔大学)

娘热·尼玛沃色在十二世纪所掘出的《八教善逝集》(*bka' brgyad bde gshegs 'dus pa*)成为了宁玛派以八密教尊神为核心修行的范本。在此前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我提出《八教善逝集》中关于“事业普巴”(*'phrin las phur pa*)的部分可能形成于娘氏之前的时代，并保留了古时的修习传统。本文结合远传法(*bka' ma*)文献中属于娘氏传承的教法，进一步对这些与《四普巴》或《四普巴续》(*phur pa'i rgyu bzhi*)相关的普巴文献进行探讨。《四普巴续》教法在这些文献中的中心地位很可能影响了此后的金刚普巴传承，因为它们也强调这些教法的重要性。本文主要探讨远传法和娘氏法中的《四普巴续》教法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早期四普巴教法之间的联系。《堡岩》(*rdzong 'phrang*)中只有《八教善逝集》是很早期的，而四普巴中的一篇简短教言很有可能是源自历史上的莲花生大师。此外，《四普巴续》中引用的同一主题也被收录进了《八教善逝集》中的权威文献。娘氏将《八教善逝集》称为伏藏，使得藏王墀松德赞被重新纳入该传承体系之中。墀松德赞原本并未在此传承序列之内，而是作为《堡岩》的主要授记对象而被新加入的。因为娘热是墀松德赞的转世，《八教善逝集》伏藏中的关键文献据称是来自墀松德赞的写本。

以药为经：医药伏藏中的炼金术与藏地的佛教医学

麦伟哲

(美国纽约大学)

伏藏师在伏藏文献中能够以叙事的方式建构宇宙观层面的教说。如藏地的医师与仪轨师多将服石法（*bcud len*）认为是莲花生大师的伏藏法，是佛陀原初的教法，或是藏地医学的经典。本文旨在对藏地的医药伏藏进行简要介绍，尤其是以相传为衮邦达沃（*Kun spangs zla 'od*，又名*Kusasmanpa* 或 *Sku sa zla 'od*）所传之《因陀罗手服石》（*Dbang po lag pa'i bcud len*）、《阿育吠陀》及《医学四续》等文献中的相关教法为中心来解读，将这些医药文献构建为佛教经典的叙事框架。总的来讲，本文提出医药经典不一定总是指向一个真实存在的过去，而是以叙事来规范其所期许的起源。与此类似，在佛教医学中，医学理论与实践指导也成为了诸佛的教海，疗愈与菩萨戒相融合，医药也成为了成佛之道。将药书作为佛典来解读，便可以将医学实践根植于一个叙事所创造的世界中。本文探究了佛教医药伏藏的叙事世界，并讨论了其在后弘期（约950-1250年）兴起的历史背景。

U rgyan pa Rin chen dpal's Speech as a Source of the *Blon po bka' thang*

Sun Penghao

(Doctoral Student, Harvard University)

Inquiries into the textual sources for O rgyan gling pa's influential treasure cycle, the *Bka' thang sde lnga*, have long fascinated scholars. It is now widely accepted that it contains authentic ancient materials. This paper identifies a passage in the twenty-ninth chapter of the *Blon po bka' thang* as being an adaptation of a speech preserved in a fourteenth-century biography of U rgyan pa Rin chen dpal (1230–1309). The intertextual relationship lies hidden, as O rgyan gling pa transfers U rgyan pa's diction and metaphors from its original context into the mouth of the legendary eighth-century figure Padmasambhava. Furthermore, the speech was modified from a general defense of the traditions of Rnying ma, *gter ma*, and Zhi byed traditions to a specific defense of the *gter ma*. This identification not only adds a fourteenth-century material to the current pool of the known textual sources of the *Bka' thang sde lnga*, but it also gives us an example of creative textual reuse and the microscopic manner in which this treasure-revealer compiled his work. Furthermore, the inter-textuality offers us a rare opportunity to reflect on the readership and reception of U rgyan pa's biography, as well a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polemical rhetoric in general.

The Impact of Lha btsun Nam mkha' 'jigs med's (1597-1652) *Gter ma* lineage on the Religious Pattern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nam rgyal Dynasty of 'Bras mo lJongs

Xu Yuanqin

(Center for Tibetan Studies of Sichuan University)

Three great masters belonging to the Rnying ma school, Lha btsun Nam mkha' 'jigs med (1597-1652), Mnga' bdag Sems dpa' chen po (1591-1656), and Kaḥ thog Rig 'dzin Chen po (17th C.) empowered Phun tshogs rnam rgyal (1604-?) as he was enthroned in 1642 to become the first religious king (*chos rgyal*), also Rnam rgyal, of 'Bras mo lJongs or 'Bras mo gshongs, that is, Sikkim. This opened the path for the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nying ma pa gter ma-revelatory tradition, from the central region of Ü-Tsang to the southern region (*lho phyogs*), Sikkim. Lha btsun Nam mkha' 'jigs med was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of the initial transmissions of this tradition, which he had received from the great *gter ma* master 'Ja 'tshon snying po (1585-1656). Upon his enthronement as religious king, Phun tshogs rnam rgyal supported the propagation of Lha btsun's tradition throughout 'Bras mo lJongs and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monasteries that would be affiliated with it.

In the process of religious development in 'Bras mo lJongs, there was a continuous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religious authority of Ü-Tsang and Lha btsun's tradition. This gradually formed a pattern of institutionalized development involving the succession of the lineages of transmission, sectarian affiliation, and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main monasteries and branches. The influence of this *gter ma* tradition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religious landscape of the early Rnam rgyal dynasty in 'Bras mo lJongs.

Prohibition and Recognition: Dissemination of the *Gter-ma* Literature of the Nying ma School in Mongolia (1607-1738)

Giigch Borjigin

(Doctoral Student,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ince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Tibetan Buddhism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in Mongolia through the spread of the Gelugpa School, which continues to the present day. Tibetan Buddhism in Mongolia undoubtedly has a strong Gelugpa presence,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classics and literature are mostly written after the Gelugpa school began to dominate Mongolia, and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other schools are very rare. However, there is no doubt that before and after the Gelugpa School was introduced to Mongolia, other schools also spread in Mongolia. In this article, I will survey the literature of the Nyingma School that was translated from Tibetan to Mongolian from 1607 to 1738, and explore three

types of non-canonical texts dealing history, ritual and commentary, and thus provide an outline of an enhanced picture of the spread of Tibetan Buddhism in Mongolia.

叙事生活世界：《格萨尔王传·地狱救母》与伏藏的社会功能

娜塔莎·麦克斯

(美国德州州立大学)

本文以《格萨尔王传·地狱救母》篇为例，探讨伏藏在创造一个“叙事生活世界”（这一理论是本文作者专门在此提出并使用的）中起到的社会功能。正如霍莉·盖利（Holly Gayley）、戴维·杰玛诺（David Germano）及其他所指出，伏藏并非单独存在的现象，而是由复杂的社交互动连接过去与未来而形成的、具有丰富意义的网络。伏藏师通常被认为是文化英雄：他们以过去的意义来涵盖当下的时代，并通过他们与过去的联系建构出一个充满意义的符号宇宙。格萨尔史诗传统尽管在藏地解读中很少被认为是伏藏，但是其传承与伏藏传承多有相似之处，其中最显著的即是经启示而被发现并创制出的新文献范式，这一范式有着超越原初讲述的社会影响。

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但只有一份格萨尔文本自我认同为伏藏，即由丹喇嘛·却吉旺秋（'Dan bla ma Chos kyi dbang phyug）所著、格萨尔伏藏师扎册多吉（Drag rtsal rdo rje）掘出的《地狱救母》篇。通过对比阅读这一格萨尔传承与伏藏传承所重叠之处，学者们可以通过格萨尔传承来更清晰地解读伏藏的社会功用。在介绍这一重要文本之上，本文更提出通过伏藏基于一个持续有意义并有效的过去而建构出的叙事生活世界，这让个人得以与这一叙事创造出来的过去产生联系，并能在其中构建出自己当下有意义的世界。叙事生活世界因此便成为了伏藏在当代西藏取得社会关切和关联的驱动力。

A Review of the *Symposium o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Yushu*

Zhu Ming

(Doctoral Student,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To celebrate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Yushu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Yushu prefecture and the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ichuan University jointly held the "Symposium o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the Culture Heritage of Yushu" in Chengdu from October 18 to 19, 2021. This symposium received a total of forty papers and nearly one hundred representatives from Beijing, Qinghai, Sichuan, Hebei, Gansu and Shaanxi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There were twenty-seven scholars who delivered presentations during eight sessions, focusing on topics such as "New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early human activities i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f rock art i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Grottoes, images and texts in Buddhist art", "Transportation and routes i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conservation in the origin region of the Three Rivers", etc. This symposium provided a level platform for academic exchange and greatly promoted interdisciplinary and cross-disciplinary academic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strengthening communica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